

晁說之與《晁氏客語》的關係

夏 長 樸

【本文提要】

晁說之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學者，著作頗多，惜多半在金人南侵時毀於兵燹，殘存於世的，幾乎全為其晚年作品。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收錄有《晁氏客語》一卷，以為晁說之所著；《宋元學案》亦有多處使用《晁氏客語》資料。似乎此書出於晁說之之手已無疑問，但事實是否如此，有待進一步的驗證。

在閱讀晁氏相關著作後，本文作者對上述傳統說法頗表懷疑，因此針對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的若干疑點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。作者發現不論就著錄、內容、思想及稱呼方面來看，這部書都有相當明顯的疑點，從而認定《晁氏客語》這本書是拼湊而成，雖然成書於南北宋之間，但不太可能是一人的作品，也不宜認定是晁說之的作品。

壹、前言

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收錄有《晁氏客語》一卷，《提要》云：

宋晁說之撰。說之有《儒言》，已著錄。是書乃其筭記雜論，兼及朝野見聞，蓋亦語錄之流。條下間有夾注，如云「右五段張某」，又云「第四段劉快活」，又有「李及、壽朋、述志」諸名氏。蓋用蘇轍《杜陽雜編》之例，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，所謂「客語」也。其中議論多有關於立身行己之大端，所載熙、豐間名流遺事，大都得自目擊，與史傳亦可互相參證。其說或參雜儒禪，則自晁迥以來家學相傳，其習尚如是。所與游之蘇軾、黃庭堅等友朋所講，其議論亦如是。此蜀黨之學，所以迥異於洛黨，亦毋庸執一格相繩。惟解經好為異說，如以《孟子》所稱「巨擘」為「即蚓之大者」，以「既入其茝」之「茝」為香白芷，云「豚之所甘」。皆有意穿鑿，與王氏《新經義》何異？未免為通人之一蔽爾。^①

《提要》的說法，大致有幾個要點：第一，這部書「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」，交代資料

① 清·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整理本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1月）卷120，頁1608。

的來歷；第二、這部書參雜儒禪，既是晁氏家學，也為蜀黨學術特色；第三，晁說之說經好為異說，與王安石《三經新義》有同樣的毛病。就此而言，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應是研究晁說之學術的基本資料，其文獻價值之重要自不待言。但是不能不說的是，《提要》的作者在下筆評論時，事先已經根據傳統的說法，認定這部書出自晁說之之手，在這種前提下，才會有上述的論述。如果晁說之作《晁氏客語》這一認知有問題，上述說法與晁說之就沒有什麼關連，而且也不具任何意義。既然如此，在衡量或採信《提要》的說法之前，我們似乎有必要先檢討《晁氏客語》和晁說之的關係究竟如何？然後再看《提要》說法是否有問題。

此前，《晁氏客語》是否為晁說之的作品，似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。但沒有人懷疑並不表示這部作品就一定沒問題，至少筆者在閱讀這部書時，對書中的許多異常現象就產生頗多疑問，思之再三，覺得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，為了敘述清楚起見，以下擬分從幾個疑點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貳、《晁氏客語》不見於晁子健所編的晁說之著作目錄中

晁說之生年不詳，《宋史》又不為立傳，文獻所載，他是北宋神宗元豐五年（西元 1082 年）的進士，卒於南宋高宗建炎三年（西元 1129 年）。晁氏活動的時間主要在北宋神、哲、徽、欽宗及南宋高宗初期，大多數的作品也都在此時完成，可惜絕大部分毀於靖康元年（西元 1126 年）金人南侵之禍。^②南渡後雖有續作，數量畢竟不多，說之卒後，作品亦乏人整理，散失殆盡。直到高宗紹興二年（西元 1132 年），其孫晁子健用了三年工夫蒐集說之遺作，僅得「律詩三百一十有二，《易規》十有一，《洪範小傳》一，《詩之序論》四，雜文十有七，書十有六，序十有三，墓誌等九，記、贊、銘、題跋四十有九，編成一十二卷。其題則謹如先志云。又得《京氏易式》并《周易太極傳》及《因說》與《外傳》稿，繕寫藏于家，以俟後之君子。」^③這是晁說之身後著作的第一次刊刻。其後晁子健藉著宦遊江淮川荆各地的機會，繼續蒐集說之遺作，終於在他及其他晁氏子孫的努力下，以十二卷本為基礎，增補擴大為二十卷本，這也是就是現今流

② 宋·晁說之：《嵩山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《四部叢刊·廣編》本，民國 70 年 2 月）卷 11，總頁 218，〈洪範小傳〉文末〈識語〉云：「說之二十餘年前為〈洪範〉之學，本諸伏生、劉向一行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，為〈傳〉數千言。靖康丙午冬，遇金賊于睢陽，五世圖書悉以灰燼，寧知有吾之〈洪範傳〉？今年戊申冬，漂流金陵，遇東里好學後生，嘗標記予傳之五行于本書。予欣然見之，如睹再生之物也。」靖康丙午為靖康元年（西元 1126 年），戊申為建炎二年（西元 1128 年），次年說之卒。

③ 同前書，卷 20，總頁 402。

傳的《嵩山文集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十二卷本的后記裏，晁子健曾詳列了晁說之的著作目錄，包括《易商瞿大傳》、《易商瞿小傳》、《商瞿易傳》、《商瞿外傳》、《京氏易式》、《易規》、《易玄星紀譜》、《詩晁氏傳》、《詩論》、《書晁氏傳》、《書論》、《春秋晁氏傳》、《春秋辨文》、《春秋年表》、《中庸傳》、《古論大傳》、《論語講義》、《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》^④及《歷譜》等十九種專書，此外另有雜著文字，如《儒言》、《參記許氏文字》、《異同志》、《有舊》、《養素削觚》、《山下草堂雜書》、《石鵲志》、《唐逸士志》、《清心堂雜志》、《隨省》、《摺變》、《嵩外墨省》、《晁氏彝訓》等十三種，兩類合計有三十二種之多，其中並沒有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。^⑤這個書目與《嵩山文集》所附《晁氏世譜節錄》中記載的書目完全相同，《晁氏世譜節錄》的書目是否另有來源，或即出於前者，不得而知。其後晁子健刊刻二十卷本時，這些資料就附刻在二十卷本之後，並未另增新的書名，可見這個書目很有可能即是晁說之著作的完整目錄。

《晁氏客語》最早著錄於南宋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。陳氏生卒年不詳，僅知其曾於理宗端平年間（西元1234—1236年）為浙西提舉，這已是南宋中期以後的事。前於陳振孫的晁公武，是晁說之的堂侄，所撰《郡齋讀書志》與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同為宋代目錄學名著，但《郡齋讀書志》僅著錄有《嵩陽晁迂生文集》十二卷，亦未著錄《晁氏客語》。據《衢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自序》所云，^⑥是書撰於高宗紹興二十一年（西元1151年），上距晁說之之卒已有二十二年之久，以晁氏後人汲汲於蒐尋晁說之著作的態度來看，此時如有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，按理晁公武不應失載。其後趙希弁刻《郡齋讀書志·附志》，晁公武門人姚應續刻《郡齋讀書志·後志》，也都未見著錄《晁氏客語》一書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中的《經籍考》部分，主要係合晁公武及陳振孫二書而成，所以著錄了《晁氏客語》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亦有著錄，但書名作《客語》，何以省去「晁氏」二字？其中不無值得推敲之處。^⑦

據筆者耳目所及，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是最早提及並使用《晁氏客語》這部著作的學者。朱熹在孝宗乾道四年（西元1168年）編輯二程兄弟的《程氏遺書》時，卷二十五

④ 案：《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》原作《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吾經小傳》，據原書所附《晁氏世譜節錄》校改。

⑤ 同前書，卷20，總頁401。

⑥ 見宋·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民國57年），所附姚應續《郡齋讀書後志》卷首。

⑦ 清·周中孚認為：「《宋志》無「晁氏」二字，省文爾。」說見所撰《鄭堂讀書記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民國57年），卷56，頁1109，《晁氏客語》條。

收錄了程頤弟子楊大隱所錄的伊川語錄 106 條，《遺書》目錄後「暢潛道錄」下小註云：「暢大隱字潛道，名見《東見錄》。此篇見《晁氏客語》中，不云何人之言，亦不云何人所記，獨聞見於延平羅氏《別錄》，則注云『暢本』，然則潛道所記與！」^⑧五年後，乾道九年（西元 1173 年）六月，朱熹編輯《河南程氏外書》時，又收錄了《晁氏客語》中暢大隱所錄語錄以外的五條資料。上述二者可能是最早引用《晁氏客語》一書的文獻記載。前面曾提過，晁子健曾兩度編輯乃祖說之的文集，十二卷本編成於紹興二年（西元 1132 年），二十卷重編本則完成於孝宗乾道三年（西元 1167 年），^⑨兩書所附的晁氏著作目錄，都未收錄《晁氏客語》。以晁氏子孫那麼勤於蒐集說之的著作來看，當時如有《晁氏客語》一書，不可能不著錄。如此說來，《晁氏客語》的出現，應是乾道三年（西元 1167 年）以後的事了。

叁、《晁氏客語》收錄的某些條目，內容不可能出於晁氏

朱熹在使用《晁氏客語》的資料時，並不是毫無保留的照單全收，在《程氏遺書》目錄所引「暢潛道錄」條下，他還加了一段話：「胡氏本亦有之，而題其上云：『張杲暘叔所傳，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。』今考之信然，故附於此。」就朱熹的口氣來看，似乎他已接受上述識語的意見，認為暢大隱所錄並非程頤的言論，所以將這些資料置於書末。果真如此的話，那朱熹為什麼不逕自刪除這些資料，以免保留下來貽誤後人，造成不必要的誤會？這是一個有待釐清的疑點，以下我們不妨就這個問題試做一些簡要的討論。

事實上「暢潛道錄」的這些資料，其中頗多警語，是後來學者探討程頤思想時，經常援引的文獻。舉例而言，譬如將知識二分為「德行之知」與「聞見之知」，此前未見，是宋儒相當重要的卓見。這個劃分雖始於張載，但深入闡發，使其成為學者接受的定論，則不能不歸功於程頤。張載說：

世人之心，止於聞見之狹。聖人盡性，不以見聞梏其心，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，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。……見聞之知，乃物交而知，非德性所知；德性所知，不萌於見聞。^⑩

張載的此一見解，開創了將道德知識與一般客觀知識加以區隔的先河，筆路藍縷之功，

⑧ 朱熹的意見見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目錄卷 25「伊川先生語十一」下，收在《二程集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本，民國 71 年），目錄頁 5。

⑨ 晁說之：《嵩山文集》卷 20，總頁 402。

⑩ 宋·張載：《正蒙·大心篇》，收在《張載集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本，民國 68 年），頁 24。

實不功沒。稍後程頤以張載的意見為基礎，進一步提出了更清楚的意見，他說：

聞見之知，非德性之知。物交物則知之，非內也，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。德性之知，不假聞見。^⑪

程頤在此明標「聞見之知」與「德性之知」，正式確立了將兩者二分的作法，他將張載的「德性所知，不萌於見聞」，改為較清楚的「德性之知，不假聞見」，強調「德行」與「聞見」無關，使得這兩種知識的分別絕對化，這種作法影響極大，後代學者對知識問題的討論，基本上都以程氏的說法為依據。^⑫值得注意的是，程頤的言論不僅見於此，同時又兩見於其弟子楊時所整理的《河南程氏粹語·心性篇》^⑬中，一則曰：「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，非德性所知，德性所知，不待於聞見。」再則曰：「聞見之知，非德性之知。德性所知，不假聞見。」文字雖有多寡異同，內容實質並無區別。楊時是傳承程頤之學的關鍵人物，程氏之學在他手上發揚光大，三傳而至朱熹，正式奠定理學在宋代屹立不搖的地位。以楊時親炙於程頤的身分，他不可能分辨不出孰為其師作品孰非其師作品。再說，晁說之雖以博學見稱於當時，^⑭但就《嵩山文集》及《宋元學案·景迂學案》所收文字而言，其長處主要在於經學，^⑮尤其是《易》學；心性之學雖偶有涉及，畢竟非其所長，自然不可能有如此精闢的理學見解。據此可以斷定上述所引這段資料應與晁說之無關，似仍以歸屬於程頤較妥。就此而言，暢大隱所錄，朱熹將其收入《程氏遺書》卷二十五的這些資料，即使不出於程頤，也絕非晁說之的作品。

⑪ 宋·程頤：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25，「伊川先生語十一」，《二程集》，頁317。

⑫ 以上關於「聞見之知」與「德性之知」的討論，主要依據余英時〈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〉，見余著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民國76年），頁431－441。

⑬ 宋·程頤：《河南程氏粹語》，卷2，《二程集》頁1253、1260。

⑭ 宋·陸游對晁說之的經學成就有非常清楚的描述，《陸放翁全集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76年1月），卷18，頁106，〈景迂先生祠堂記〉云：「公之學深且博矣，於《易》，自簡翟下至河南邵先生；於《書》，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；於《詩》，雜以齊、魯、韓，（案：《四部叢刊·正編》影印明華氏活字本《渭南文集》，此下多「三家」二字，當據補。）不枯於毛、鄭；於《春秋》，考至賈誼、董仲舒，不膠於啖、趙。其所引據，多先秦古書，藏山埋冢之祕。卓乎獨立，確乎自信，雖引天下而與之爭，不能奪。卒成一家之說，與諸儒並傳。」樸案：明華氏活字本《渭南文集》卷18，葉11、12誤倒，臺灣商務印書館據以影印，收入《四部叢刊·正編》，故〈景迂先生祠堂記〉自「拜床下者」至「而士大夫猶」凡18行306字，遂誤奪至〈圓覺閣記〉中，而上述引文正在其內。

⑮ 清·紀昀等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154，頁2075，〈《景迂生集》提要〉云：「說之博極群籍，尤長經術，著書數十種。」

肆、書中多稱引肯定孟子，與晁氏言行不符

晁說之「早遊溫公之門」，^⑩深受司馬光的影響，司馬光晚號「迂叟」，晁說之也自號「景迂生」，可見他對司馬光是何等景仰！司馬光因王安石尊孟而疑孟，而晁說之也在司馬光的影響下大力抨擊孟子，^⑪態度之激烈猶在司馬光之上，誇張一點的說，他與孟子幾乎是勢不兩立。^⑫翻閱晁說之的著作，可以發現批孟反孟的言論普遍存在於他的文集中。不僅如此，北宋末年，他甚至爲了反對太子讀《孟子》書而上書欽宗，引起朝士及太學生公憤，因而被迫去職。^⑬以這樣背景的人，突然改變態度，大力稱讚起孟子，豈不是一件怪事！但檢閱今本《晁氏客語》中，引述《孟子》或討論《孟子》之處所在多有，如：

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」此爲君而言也，非爲臣者所以責君；

「父子之間不責善」，此爲父而言也，非爲子者所以責父。^⑭

「管仲、曾西之所不爲」，可以觀志，若功業則別論。「說大人則藐之」與「我得志弗爲也」事甚淺近，孟子以言者，恐與淺近者言。^⑮

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」見於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，「父子之間不責善」則見於《孟子·離婁上》。「管仲曾西之所不爲」見於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，「說大人則藐之」與「我得志弗爲也」則見於《孟子·盡心下》。類似這些引用《孟子》書中語以論述道理的條目還有好幾處，不再一一引出。值得一提的是上述「父子之間不責善」一條，很明顯的在詮釋《孟子》立言的內容，立場大致可說是肯定而非否定《孟子》。湊巧的是晁說之在其文集所收的《與呂舜徒書》中，就曾批評過這一條，他說：

⑩ 見晁說之《嵩山文集》，卷17，總頁335，〈送王性之序〉。

⑪ 清·黃宗羲等：《宋元學案》（浙江：浙江古籍出版社《黃宗羲全集》本，冊四，1992年），卷22，頁135，《景迂學案》載汪玉山〈與呂逢吉書〉：「晁以道力闢王安石，因王安石尊孔子、孟子而非之，不亦過乎？」全祖望案語云：「景迂不喜孟子，蓋亦迂叟之派。其說經，不苟同於前儒。」

⑫ 有關晁說之反孟的討論，請參看拙撰〈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，第9期（民國86年），頁115-144。

⑬ 清·黃宗羲等：《宋元學案》，卷22，頁93，《景迂學案》載：「靖康初，召至京，除祕書少監，兼諭德。已而以中書舍人兼詹事，淵聖以宿儒待之。先生學於溫公，守其《疑孟》之說，又惡荆公，而荆公最尊孟，先生請去《孟子》于講筵，欽宗從之，太學之士譁然，言者紛起。又力言……，皆與當政者不合。又言：『荆公不應配享神宗，安得配享孔子？』于是……落職，提舉西山景福宮。」

⑭ （舊題）宋·晁說之：《晁氏客語》（上海：上海涵芬樓影印《學海類編》本，民國9年），總頁1316。

⑮ 同上書，總頁1316。

說之遠宦，窮寂如初，無足言者。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，所謂「樂有賢父兄」之說，則未喻也。是出於孟子乎？試爲吾友陳之：……舜五十而慕爲瞽叟之賢歟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，王季之德不與也。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。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，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。且其言「父子之間不責善」則疏之矣，今何望之深耶？^②

這裏說「父子之間不責善」一語「疏之矣」，絕非肯定之辭，是完全可以確定的。〈與呂舜徒書〉是晁說之的作品既無可疑，他對同一事件的看法前後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轉變，既然如此，上述引文應非出於晁說之之手。

除上舉例子外，《晁氏客語》中，最推崇孟子言論的，有下列幾條，如：

學者當以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爲本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既治，則《六經》可不治而明矣。^③

君子之學也，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」，而老子以爲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」，其亦自賊其性歟！^④

楊子，無自得者也，故其言蔓衍而不斷，優游而不決。……荀子，悖聖人者也，故列孟子於十二子，而謂人之性惡。性果惡邪？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？^⑤孔子沒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。孔子沒，傳孔子之道者，曾子而已。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傳，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。孟子曰：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」故知《易》者，莫若孟子。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跡息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《春秋》無義戰，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」征者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故知《春秋》者，莫若孟子。^⑥

這些條目共同的特色是極力肯定孟子，不僅並舉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而且認爲二書已治，則「《六經》可不治而明矣」。對《論語》有這樣的評價猶有可說，將《孟子》也一併帶上，則非比尋常。再則又以《孟子》書中具體言論爲例，論證孟子不僅知《易》，同時也知《春秋》，進而肯定孟子的經學造詣，這種看法應該不是偶然一時起興。最值得注意的是末一條，不僅強調孟子在儒家傳承上有其一席之地，是孔子、曾子、子思以下的當然代表人物，甚至說「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」一語，不是非常推尊

^② 見晁說之《嵩山集》，卷15，總頁279。

^③ （舊題）宋·晁說之：《晁氏客語》，總頁1327。

^④ 同上。

^⑤ 同上書，總頁1329。

^⑥ （舊題）宋·晁說之：《晁氏客語》，總頁1330。

孟子的人是說不出這樣的話語的。也正是這種尊崇孟子的態度，使得作者非常不滿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批判孟子的言論，因而要質疑荀子是「悖聖人者也」。從上述這些言論可以清楚的看出，抱持這種想法的人，基本上是極為尊崇孟子的，這和晁說之一貫的反孟態度簡直是格格不入。以下我們舉兩個晁說之反對「孔孟」並稱的具體實例來加以說明：

1. 自從韓愈〈原道〉以孟子上承孔子以後，透過王安石等人的大力倡導，孟子在宋儒眼中的地位大幅提升，所謂「孔孟」並稱，也逐漸在學者中流行起來。^{②⑦}晁說之對這種說法非常不以爲然，他說：

「孔孟」之稱誰倡之者？漢儒猶未之有也。既不知尊孔子，是亦孟子之志歟？其學卒雜于異端，而以爲孔子之儔者，亦不一人也，豈特孟子而可哉？如知《春秋》一王之制者，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。世有「荀孟」之稱，荀卿詆孟子「僻遠而無類，幽隱而無統，閉約而不解。」不免爲諸子之徒，尙何配聖哉？^{②⑧}

這段議論見於晁說之《儒言》一書中的〈孔孟〉條。《儒言》在晁子健所整理的著作目錄中已有著錄，其可靠性毋庸置疑。在這段資料中，晁說之不僅反對「孔孟」並稱，將司馬遷以來世所習稱的「孟荀」貶抑爲「荀孟」，更搬出《春秋》一王大法來壓抑孟子。他的作法固然有過火之嫌，卻也將他不顧人言，堅持己見，反孟貶孟的態度發揮得淋漓盡致。^{②⑨}以這樣的人，他會說出「孔子沒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。孔子沒，傳孔子之道者，曾子而已。曾子傳之子思，子思傳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傳，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」這樣的話來嗎？仔細思之，答案無疑是否定的。

2. 晁說之另有〈辯誣〉一文，也表達了類似的見解，他說：

齊晉之功非不盛也，吳楚之王益崇也，《春秋》不之貴者，尊一王也。門內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，予不知世所謂「孔孟」云者孰自而得耶？其尊孔子歟？尊孟子

②⑦ 宋·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民國57年），卷3，頁68，語孟類小序即說「前志《孟子》本列於儒家，然趙岐固嘗以爲則象《論語》矣。自韓文公稱『孔子傳之孟軻，軻死不得其傳。』天下學者咸曰『孔孟』，孟子之書，固非荀、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。今國家設科取士，《語》、《孟》並列爲經，而程氏諸儒，訓解二書，常相表裏，故今合爲一類。」神宗熙寧四年（西元1071年），更定貢舉新制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同爲兼經，見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220。陳氏的說法應屬可信。

②⑧ 宋·晁說之《嵩山集》，卷13，總頁250，《儒言·孔孟》。

②⑨ 陸游曾說他：「卓乎獨立，確乎自信，雖引天下而與之爭，不能奪。」（見注①④），又說：「晁以道著書，專意排先儒，故其言多而不通，然亦博矣。」（《陸放翁全集·渭南文集》卷29，頁178，〈跋晁以道《書傳》〉）陸游與他有姻親關係，是他的晚輩（見《陸放翁全集·渭南文集》，卷30，頁183，〈跋諸晁書帖〉），這個觀察應該可信。由此可見晁說之的個性是相當固執的。

歟？^⑩蓋天下萬世尊師者，孔子一人而止耳。容孰偶之邪？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，欲挽二子以並駕，又無乃甚邪？荀卿非孟子「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」，王充著論曰〈刺孟〉，則亦過矣，然不為無謂也。……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顏淵，而原憲、子貢、曾參、宓子賤之徒悉口之者，不知世無孔子，果孰可以諸子優劣邪？使孟子與諸子並生，而從容弦誦闕里中，當自有次第哉！^⑪

在此，晁說之清楚表明只尊孔子的態度，所謂的「尊一王」，所謂的「尊無二上」，明白說來，就是不許有人與孔子並駕齊驅。我們固然能理解他力持「天下萬世知尊師者，孔子一人而止」的立場，而他排斥孟子，不喜孟子的態度，絕不是「則亦過矣」一語所能帶過的。

就上述兩段資料來看，晁說之反對孟子的態度相當明確而且堅定不移。要說這麼反孟的人會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尊孟的文字，不僅肯定孟子，而且又以孟子上承孔子的傳承，簡直是難以理解，而且也說不過去。若說晁說之晚年思想有所轉變，由斥孟轉成尊孟，由於沒有文獻足資佐證，也不可能逕行認定。再說現存晁氏《嵩山集》中文字，絕大部分是晁說之晚年的作品，恰好證明他反孟的立場始終如一，並沒有晚年有所改變這種情事。上述所引這些條目，恰好都見於暢大隱所錄的程頤《語錄》中，出現這種現象應該不是偶然。如此說來，《晁氏客語》由「《大學》曰：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進道矣。』」這一條起，到「禮之本，出於民之情」條止，一共 94 條，^⑫也就是朱熹收入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二十五的這一部分資料，恐怕還是歸屬於程頤較妥；放在晁說之的名下，當作他的作品處理，是很嚴重的錯誤。

伍、《客語》中某些條目，重見於他書

除暢大隱所錄的 94 條外，《客語》中有某些條目，同時見於他書，如：「一日克己復禮」條，又見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十七〈伊川先生語三〉；「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」條、「人臣事君」條，又見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十九〈伊川先生語五〉的「陳平只是幸而成功」條，只是《客語》簡省了許多；「張良以五世事韓為報仇」條，又見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十八〈伊川先生語四〉「王介甫詠張良詩」條及同書卷十九〈伊川先生語五〉「張良亦是個儒者」條。這些與《河南程氏遺書》重見的條目，除上開「一日克己復禮」條文字稍繁外，其餘文字普遍少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。雖說《河南程氏遺

⑩ 按：「孟子」，原誤作「孔子」，據上下文意校改。

⑪ 晁說之《嵩山集》，卷 14，總頁 259，〈辯誣〉。

⑫ 由於條目分合不同，朱熹收在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二十五的一共一百零六條，《晁氏客語》有「或問文中子曰」一條，朱熹失收。

書》遲至乾道四年（西元 1168 年），纔由朱熹編成，但此前二程門人所記的《客語》已經流傳各地，朱熹所作的是因「先人舊藏」然後「益以類訪求，得凡二十五篇」，^③成書的時間雖稍晚於《客語》，但內容的流傳應該早於《客語》。比較可能的解釋應是《客語》取自於流傳各地的《二程語錄》，也就是取自於《河南程氏遺書》的前身，而非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取自於《客語》。

陸、《客語》中的稱呼，與晁氏風格不符

《客語》中有一條涉及到晁說之的先人，頗值注意，全文如下：

太傅迴公謝事燕居，^④獨處道院，不治他務，戒家人無輒有請。惟二膳以時而進，既畢即徹，若祭享然。子宗慤擢正字，易章服詣謝，公亦不顧。其夫人嘗密覘之，但見瞑目端坐，鬚髮搖風，凝然若木偶。嘗有詩云：「鍊礦成金得寶珍，鍊情成性合天真。相逢此理交談者，千百人中無一人。」^⑤

晁迴、晁宗慤分別是晁說之的玄祖與曾祖，而此處晁說之竟毫不避諱，直呼其名，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，也頗令人詫異。這因晁氏為宋代詩書世族，家風以嚴謹著稱，與其同時而年輩稍後的呂本中，對晁氏的家教即頗為稱道。呂氏的《童蒙訓》說：

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，論當世邪正善惡，是是非非，無不精盡。至於前輩行事得失，文字工拙，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，或有未至，後生敢略議及之者，必作色痛裁抑之曰：「先儒得失，前輩是非，豈後生所知！」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、晁丈以道，規矩最嚴，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，皆有敦厚之風，無浮薄之過。^⑥

呂氏也是宋代著名世家大族，^⑦呂、晁兩氏數代交好，^⑧來往密切，對晁氏如此推崇，

③ 宋·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69 年 10 月），卷 75，總頁 1321（《程氏遺書》後序）

④ 案：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《晁氏客語》，「太傅」前多一「晁」字。

⑤ （舊題）宋，晁說之撰：《晁氏客語》，總頁 1321。

⑥ 宋·呂本中：《童蒙訓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民國 57 年 3 月），卷中，頁 13。

⑦ 宋東萊呂氏，衣冠最盛，是宋代著名望族，宋·王明清《揮塵前錄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·廣編》本，民國 70 年 2 月），卷 2，總頁 15，即云：「本朝一家為宰執者，呂氏最盛。」黃宗羲等《宋元學案》（浙江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《黃宗羲全集》本，1992 年 1 月）冊 4，卷 19，頁 11，〈范呂諸儒學案〉，王梓材案語引全祖望《謝山笥記》云：「呂正獻公（今案：呂公著）家，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。」可見呂氏一族在政壇、學界均有極佳表現。有關呂氏家族的研究，請參看孔東《宋代東萊呂氏之族望及其貢獻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77 年 1 月）。

⑧ 宋·呂本中《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》（吳興陸心源十萬卷樓重刊本，清光緒 3 年），頁 3 下

應非過譽之詞；也可見晁氏的家規的確甚嚴，否則不會得到如此的肯定。由「規矩甚嚴」一語，可以知道晁說之本人對居家禮數尊卑長幼有序的分寸極為講究，絲毫也不放鬆。以這種態度整飭家居儀節，又處處講求進退有序的人，可以想見其心態之保守，與行事之拘謹守禮。晁說之認為不僅對先儒前輩宜有尊敬，其他待人接物，稱呼應對，也都應講究尊卑儀節，務以合禮為度。這也可以從下列所舉資料得知，呂本中又說：

近世故家，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（原注：一作「能以道訓戒子弟」。）皆有法度。群居相處，呼外姓尊長，必曰「某姓第幾叔若兄」；諸姑尊姑之夫，必曰「某姓姑夫」、「某姓尊姑夫」，未嘗敢呼字也。其言父黨交遊，必曰「某姓幾丈」，亦未嘗敢呼字也。當時故家舊族，皆不能若是。^③

不論是外姓尊長或是父黨交遊，都以禮相待，並且各如其分的給予適當的稱呼，這是晁說之一家申戒子弟時，所嚴格要求的「法度」。晁說之並因此受到呂本中的極度肯定。就此而言，晁說之本人必然也是言行一致，講究禮數稱呼的彬彬君子。以這麼嚴以律己律家的讀書人，會因一時疏忽而直呼尊長之名，毫不注意避諱，豈不是非常奇怪的事？晁迥、晁宗慤都不是無名之輩，迥字明遠，諡文元；宗慤字世良，諡文莊。晁說之《嵩山文集》中提及這兩位長輩時，一概尊稱曰「文元公」、「吾文莊公」、「曾大父文莊公」，^④無一例外，這也充分印證了呂本中的說法無誤。此外兩人也有其他字號，任擇其一而稱述，即可避免直呼尊長名諱的不敬，深通禮數的晁說之竟不此之圖，豈不令人訝異？再說，此書既名《客語》，所記當然為來客訪客之語，來客知道晁氏先祖家居之事已經是奇怪的事，竟然又毫不避諱的直稱主人祖先之名，而主人還以直書，豈不也是怪事一件？更匪夷所思的是，以晁氏後人記載其祖先軼事，竟然還要冠上姓氏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。綜合上述種種不合理的現象，這一條資料絕非出於晁說之之手。

柒、傳世《客語》有拼湊的痕跡，應非出於一人之手

在翻閱《客語》一書時，稍微用心，就會發覺這本書在結構上並不出於一人之手，而且這個跡象很明顯。大致說來，這本書可以分作下列幾個部分：

載：「文靖（今案：呂夷簡）丈事晁文元（今案：晁迥），而晁文莊（今案：晁宗慤）丈事文靖，諸家事契，無如二家之深。後晁丈說之以道事榮陽公（今案：呂希哲）如親子姪。」由此可見呂、晁二族數代交往之深，往來之密切。

③ 宋·呂本中：《童蒙訓》，卷上，頁10。

④ 如晁說之《嵩山文集》，卷17，總頁326，所收的《崇福集序》與《文林啓秀序》兩篇文章，在提到其高祖父晁迥與曾祖父晁宗慤時，都用「文元公」、「文莊公」這種敬稱，從未有直呼其名的現象出現。

1. 由篇首「古之學者爲己」條，至「擇之爲事常怕有偏重處」條，再加上書末「范文正公」以下六條，爲第一部分。這裏所涉及的人物有：呂大臨、王安石、韓琦、曾公亮、蘇軾、張詠、章惇、王安國、范純仁、范仲淹、鄒浩、陳襄、徐積、游酢、楊時、陳井、劉安世、呂希哲、呂公著、韓治、許將、呂正叔、范鍾、韓忠彥、蒲宗孟、胡宗回、司馬光、李常、梅堯臣、韓維、元絳、丁謂、蔡襄、豐稷、陳淵、程頤、程顥、孫覺、劉涇、陸佃、王回、子中、張載、李左、邵伯溫、邵雍、劉輝、林通、王玠玉、周天祐、潘涓老、晁迥、晁宗慤、張繹、趙扑、文彥博、李師中、呂蒙正、祝林宗、暢大隱、張觀（依原條目先後序）等，除時代不明者外，絕大部分人物都在晁說之之前或與其同時，其中鄒浩更與晁說之同爲元豐五年進士。就時間來看，這些條目有可能出於晁說之，也可能出於同時其他人之手。但「一日克己復禮」、「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」、「人臣事君」、「張良以五世事韓」等條，論述《孟子》各條以及「太傅迴公」條，都不會是晁說之的作品。
2. 自「《大學》曰物有本末」至「禮之本出於民之情」，計 94 條，朱熹收入《程氏遺書》卷二十五，仍應歸於程頤的名下；即使不出於程頤，也應出於理學大家之手。可以確定的事，絕不會是晁說之的作品，原因在於學風不符，路數不對。這是第二部分。
3. 自「范純夫燕居」條起，至「邵成章云元祐中」條，共計 31 條，全記范祖禹事，首尾一貫，與其他條目各自獨立不同。似乎是從其他有關范祖禹著作抄來，也不應收入本書。這是第三部分。

就這個結構來看，本書是雜抄湊合而成的作品，雖是兩宋之交的作品，但非出於一人之手，也不是晁說之的作品，不應在《客語》之前冠上「晁氏」二字。

捌、附論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法辨誤

在處理過《客語》的作者問題諸疑點之後，筆者擬就本文開頭所引《四庫全書總目·晁氏客語提要》涉及到的兩個問題略作澄清。

（一）《客語》一書，並未逐條標記資料來源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曾說《客語》用蘇鶚《杜陽雜編》之例，「每條各記所語之人，所謂「客語」也。」並舉了「右五段張某」、「第四段劉快活」及「李及、壽朋、述志」等文字爲例，以證成其說。但細檢全書，《客語》有類似記載者，除《四庫提要》已舉者之外，僅有「石子殖說呂申公」條下的「謝」，「西方興師」條下的「深甫」，共計二人，與《四庫提要》所云不符，而且這兩條也都在上所云的第一部分。《四庫提要》本條的作者，僅據少數幾條現象，即云「每條各記其所與之人」。這一判決未免過

於武斷，不僅以偏概全，也有誤導讀者之嫌，實不足取。

(二)《客語》參雜儒禪現象，不應解釋為蜀黨與洛黨的差異

《四庫提要》說：「其說或參雜儒禪，則自晁迥以來家學相傳，其習尚如是。所與游之蘇軾、黃庭堅等友朋所講，其議論亦如是。此蜀黨之學，所以迥異於洛黨，亦毋庸執一格相繩。」晁說之的高祖父晁迥好佛，這是事實，不僅《宋史》本傳有明文記載，又撰有《法藏碎金》一書。而晁說之本人一直以儒者自居，晚年轉而佞佛，日誦《法華》，甚至自稱「天臺教僧」、「國安堂老法華」，也是事實。全祖望撰《宋元學案·景迂學案序錄》，對此還甚為惋惜，惜其晚節未能堅持。^④但是，《四庫提要》作者在「所與游之蘇軾、黃庭堅等友朋所講，其議論亦如是」之後，接著所說的「此蜀黨之學，所以迥異於洛黨，亦毋庸執一格相繩」一語，卻頗有斟酌之必要。原因在於，這句話相當含糊，將蜀黨、洛黨之別過於簡化，容易誤導讀者，將「議論是否參雜儒禪」這一點，當成蜀黨、洛黨區分的唯一判準，若果如此，則是學術研究上相當危險的一件事。宋代蜀學與洛學的差異是學術問題，蜀黨與洛黨之爭則是政治問題，兩者各有其具體內涵，實不宜混為一談。《四庫提要》作者在行文上過於簡要，又接著晁說之的交遊而發議論，很容易造成讀者以為晁氏也是蜀黨中人的誤會。

其次，《四庫提要》的行文方式，也有導致讀者誤認晁氏為蜀學人物的危險。蘇軾極欣賞晁說之，「東坡稱其自得之學，發揮五經，理致超然，不踐陳跡，嘗以『文章典麗，可備著述』薦之。」^⑤這是事實。但蘇軾欣賞他，並不表示晁氏就是蜀黨人物，這可從幾個方面來看：第一，與蘇軾密切交往，並且深受其影響的是晁補之。晁補之是晁說之的從兄，與秦觀、張耒、李廌並列蘇軾弟子，號稱「蘇門四學士」。說晁補之是蜀學人物，應該說得過去，起碼《宋元學案》是這麼歸類的。第二，晁說之在《宋元學案》中自有《景迂學案》，這是全祖望所補入的。在《景迂學案》所附的〈景迂學案表〉中，晁說之被列為「涑水、姜氏、楊氏門人。泰山、徂徠、百源再傳。」就此而言，晁說之的學術直接淵源於司馬光，與蜀學、洛學皆了不相涉，所以既非蜀學人物，也非洛學人物，所謂蜀學、洛學差異，跟他並不相干。

④ 黃宗羲、全祖望：《宋元學案》，卷22，頁92，〈景迂學案序錄〉云：「祖望謹案：涑水嘗令景迂續成《潛虛》，景迂謝不敢，然《易玄星紀》之譜，足以紹師門矣。景迂又私淑康節，惜其晚年之好佛也。然元城亦不免此。」同書〈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傳〉亦云：「先生粹然儒者，惜乎晚年頗信佛氏之說，日誦《法華》，自稱『國安堂老法華』，又稱『天臺教僧』。論者謂其盛時欲詆孟子，而老不自振。然其遺命，令子孫訪類遺文，當以嵩山景迂生日之，則未敢背師門之傳也。」

⑤ 清·黃宗羲、全祖望：《宋元學案》，卷22，頁92，〈景迂學案·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傳〉。

玖、結語

晁說之是南、北宋之交的一位學者，畢生服膺司馬光，深受司馬光的影響，這由他自號「景迂生」可以清楚的看出來。他是宋代反孟運動的大將，在宋代孟學地位上升的過程中扮演了主動攻擊孟子的角色，也曾經影響過欽宗皇帝的尊孟態度。晁氏著作甚為宏富，由於身經靖康之禍，飽受顛沛流離之苦，生平著作散失殆盡。其後雖經晁氏子孫用心蒐集，歷數十年之久，先後輯成《嵩山文集》十二卷本及二十卷本，但較諸晁氏原有，僅得十之一、二。在這種情形下，《晁氏客語》一書的出現，對了解晁說之的學術，實具有拾遺補缺的作用，意義自然不同。因此從朱熹開始使用這部書後，數百年來的學者對這部書並無異辭，全祖望在補編《宋元學案》時，也頗有一些資料取材於此書。類此使用《晁氏客語》資料的現象雖不在少數，但引用使用頻繁，是否就表示這部書一定沒有問題呢？

上海涵芬樓影印舊抄本《嵩山文集》二十卷，是目前最完整也是可信度最高的晁氏文集版本。《文集》後附有晁子健所編的晁說之著作目錄，晁子健是說之的孫子，此一目錄的可信度自然甚高。值得玩味的是，目錄中著錄的書籍計三十二種，《晁氏客語》一書卻不在其中。證之以晁子健在《文集》後記中所說「竊記所亡書目于後」一語，則晁子健對其祖父著作知之甚稔，不可能有所遺漏。如此一來，傳世的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，究竟是否出自於晁說之本人之手，就頗值得討論。

透過上述各節的討論後，我們可以說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大有問題，原因在於這部書是拼湊而成，絕非一人的作品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這部書「所載熙、豐間名流遺事，大都得自目擊，與史傳亦可互相參證。」就瀏覽所及，書中記載大部分是神宗熙寧、元豐名人軼事言論，這一點誠然不錯，但合於此一條件的學者，並非只有晁說之一人。更何況就筆者前面分就此書之著錄、主要思想及稱謂等相關證據來看，這部書不出於晁說之的可能性更大。真要說可能是晁氏作品的恐怕也只有《客語》中由篇首「古之學者為己」條，至「擇之為事常怕有偏重處」條，再加上書末「范文正公」以下6條。其餘部分自「《大學》曰物有本末」至「禮之本出於民之情」，計94條，朱熹收入《程氏遺書》卷二十五，即使不出於程頤，也不會是晁說之的作品。而自「范純夫燕居」條起，至「邵成章云元祐中」條，共計31條，全記范祖禹事，首尾一貫，與其他條目各自獨立不同，可能是從其他有關范祖禹著作抄來，似乎也不應視為晁說之的作品。整體來看，我們應將世稱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與晁說之之間的關係加以釐清：書是書，人是人，二者不宜混為一談。《晁氏客語》這部書應是北宋末或南宋初的作品，「所載熙、豐間名流遺事，大都得自目擊」，可以用來做為研討神宗以下北宋歷史的史料；但不應

沿襲前人之誤，認為這部書即出自晁說之之手。就此而言，《宋史藝文志》僅著錄《客語》，不同於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文獻通考》著錄《晁氏客語》，態度上反而顯得比較謹慎。

（本文作者現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）